

學淵精懋 恩深似海

懷念 程天放 先生

程寶珠 編著

謹以此書獻給祖父母在天之靈





第一章 學淵績懋





程天放先生生平事略

（一）誕生於書香名門

程天放先生出生於書香世家，祖籍江西新建，大塘「汪山土庫」的後代。追溯程氏的祖先，他們來自河南洛陽，東晉時期遷至安徽歙縣，後遷於江西新建的大塘坪鄉，傳至清乾隆時期，有倆兄弟開始定居於附近山明水秀的汪山岡，他們育有九子，於嘉慶年間，其中三兄弟皆金榜題名為進士，成就了「一總督，兩巡撫」的輝煌，此後家族開始興旺，後代子孫人才輩出，有十一名舉人、四名進士、學者專家上百。於道光年間兄弟們在汪山岡上興建了一座規模浩大、占地108、1443房間、572個天井的古樸莊嚴建築—「汪山土庫」。老大湖廣總督喬采之孫仲之為杭州同知，仲之於1899年農曆正月十六，得一子名學愉，後改名為天放。

（二）幼年到中學的求學經歷

天放先生生於杭州，十歲時隨病重的父親返回故居「汪山土庫」，兩年後其父即與世長辭。因年幼喪父，較一般同齡的孩子早熟且個性穩重。在私塾上學時，天資聰敏又好學不倦，能一目十行，過目不忘，在家鄉有神童之稱。直到老年，自幼所讀的古文、唐詩宋詞等依然可以朗朗上口。先生家中藏書甚豐，他在家鄉三年求學於家塾中，除了讀儒家思想的古書之外，也涉獵歷史、地理、科學各方面的書籍，從

歷史小說「孽海花」中得知反清復明的哥老會及提倡革命的領袖「孫汶」（孽海花書中所用的原名），和「揚州十日記」清軍初入關後屠殺漢人和秋瑾被捕就義的歷史，同時從「地球韻言」、「海國圖志」等書中瞭解了世界地理，知道中國工業落後，看到滿清政府的腐敗，中國受到列強的壓迫，從此就立志要參加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因此雖然出生官宦世家，從曾祖父起代代都在清朝爲官，家人也希望日後他能承襲祖業效命於朝廷，但是生長於內憂外患的時代，救國的革命思想早已深植於心，因而引導他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1911年，先生十三歲，革命黨武昌起義成功，三星期後南昌也光復，他在家鄉得知勝利的消息，立刻剪了辮子，表示支持革命。民國成立後，新學堂興起，同年他離開了家鄉，到南昌接受新式教育。先入洪都中學，因洪都中學學風散漫，一學期後轉入學風嚴謹的私立心遠中學，刻苦勤學，中英文皆出類拔萃，深得校長的器重。在校時首次用英文投稿，被錄取刊登在商務印書館的英文雜誌上。

在心遠中學求學期間，中國在袁世凱的控制之下，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全國上下群情激憤，先生即代表同學起草電文，主張拒絕簽約，萬一日本用兵，當以武力抵抗。正預備聯合南昌各中學拍電文給袁政府，不料袁世凱已屈服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約，因此他救國意識越發強烈和堅定。



（三）領導五四愛國運動

心遠中學畢業後，於1916年進入復旦公學（現上海復旦大學），在他四年大學生活裡最值得回憶的就是參加了學生的愛國運動。當時袁世凱已亡，政權在北洋軍閥手中，政治依然腐敗。

1917年北洋軍閥張勳等人解散國會，又將溥儀捧出來復辟。先生與幾位同學對於軍閥的橫行，異常氣憤，因此聯絡上海各校愛國青年組織中華全國學生救亡會，想喚起人民共同來挽救民國的危機。他們典當衣服，租了個小辦公室，發宣言、拍電報、辦雜誌、雖然後來因為學生們缺乏資金，因而無法繼續。這是開風氣之先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運動，比五四運動還早了兩年。

在復旦求學期間，1919年戰勝國對戰敗國在巴黎的凡爾賽簽署條約，要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交給日本，因此在北京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月四日愛國運動。先生和幾位同學在復旦大學領導上海各地學生響應北大的「五四運動」，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並進行抵制日貨。六月三日他帶領千人學生罷課遊行，不畏荷槍實彈的軍警，在滂沱大雨中，昂然前進，上海市民受到學生愛國精神的感召，紛紛拿出雨傘為學生們遮雨，且跟隨著學生遊行抗議，全國大專院校及舉國上下也都相繼響應，北洋政府代表在衆怒難犯之下，也就不敢簽字，學生運動總算初步成功。



之後他當選為上海學生聯合會會長和上海學生聯合會日刊的總編輯。因才思敏捷，學生會重要文稿多出其手，其演說也令聽者動容。國父孫中山先生從報上讀到其言論倍加讚賞，因而多次召見，聽其建言並勉勵有加。有一次在國父寓所，首次見到了後來的中華民國總統 蔣中正先生。

（四）負笈美洲

1920年先生考取江西省公費留考，赴美留學，初主修哲學。後於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轉讀政治，於1922年獲政治學學士，1923年獲碩士學位。且參加國民黨，當時江西省公費時斷時續，經濟拮据，無力負擔為數不小的黨費，由邵元沖先生代為請示國父批准免繳黨費，蒙國父應允，因他此次之請，從此國外留學生入黨皆免繳黨費（原件存於台灣的黨史陳列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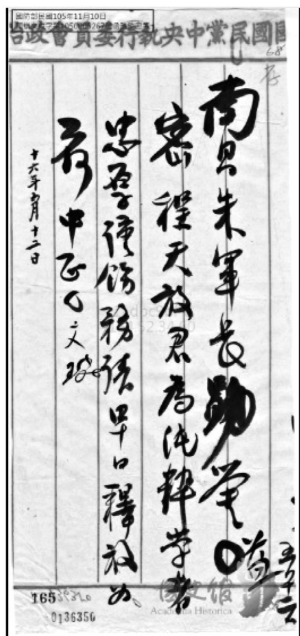
因為公費時斷時續，後為了生計問題，應加拿大的「醒華日報」之聘請，到報社擔任總編輯，並且參加黨務工作，膺選國民黨加東分部長，宣揚革命主張，溝通僑胞感情，並促進東西兩岸僑胞團結，增加僑胞捐款，所獲捐款少數留做當地黨務費用，多數匯回中國廣州，支持北伐。同時進加拿大多倫多（Toronto）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加拿大的東方移民〉（Oriental Immigration in Canada）以生動的筆調，分析國際公法的複雜問題，細數東方移民的艱辛歷史，為東方移民遭受的歧視提出正義的呼聲，可為後人研究國際關係提供寶貴的史料，此論文在加國報紙刊登，使



加國政府對東方移民有深刻的認識。

（五）南昌四二暴動

先生於1926年學成返國後，初任大學教授。當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克服江西後，於1927年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四月二日於南昌發動暴動，省黨部被毀，天放先生與羅佩秋先生等國民黨員被共黨逮捕，共黨組織的民衆法庭，決定在五卅慘案紀念日遊行後處決他們。事變消息傳到上海，蔣總司令立刻致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保護國民黨同志。朱培德那時雖然表面上順從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卻又不願和南京的國民政府決裂，所以在判決書上批了「時局嚴重，暫緩執行」，並將江西的共產黨員送往武漢，先生才趁機脫險，化妝易名，經由水路逃往南京，其他三名國民黨員也相繼逃出。



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
002-080200-00023-068

（六）出使德國（1935—1938）

逃抵南京後，任職中央軍官團政治部主任、監察委員、安徽省代理省主席、安徽大學校長、浙江大學校長、教育廳長等職，先生於1935年，時年僅36歲被任命為第一任駐德大



駐德大使勳章

使。他原習國際政治，至此得學以致用，在他的生命史上展開了全新的一頁。

當年出使德國時，正值日本侵華的野心昭彰，蔣委員長爲聯俄制日，祕密派遣陳立夫先生化名李融清，以中校官銜隨先生出使德國，打算由德轉俄，以防日方發現。立夫先生裝病關在船艙房間內24天，從未露面，始終未被發現。後因史達林避而不見，此計劃未能實現。

先生抵達柏林後，自此開始了他一生最爲艱辛的一段經歷。在駐德期間，國家國力艱難，不但館內的經費和人員短缺，有關中德關係，中國史料及國際公法等應有的資料也非常缺乏，國內的消息及情報又很遲緩。日本大使館因經費充裕，消息靈通，我國在宣傳上根本無法和日本競爭。



駐德時除了和德國的總統府、國防部、外交部、經濟部、宣傳部時常做多方面的溝通，還和駐德的美、英、法等國大使密切交往，獲取重要外交信息，有助於國家的外交政策，同時解決不少僑胞問題，如長期困擾中德關係的浙江籍非法入境僑胞的居住和營業問題，取得相當大的外交成就。

1936年正逢第十一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舉行，這次運動會是自1920年恢復奧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我國派出空前未有，陣容浩大的120多人代表隊前往參加，先生帶領使館同仁全力籌備迎接，熱誠招待，並致詞勗勉團員：「代表團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表現新中國的新精神、新生活，使得世界各國人士對我國產生良好印象，另一方面要觀摩德國人團結一致、擁護政府、埋頭苦幹、百折不撓的精神」。他希望一盤散沙的中國人能效法德國的精神，團結努力，建設強盛的中國。

先生在德國的重大任務之一是和德國交涉購買武器與軍火以抵抗日本；中德兩國於1936年簽訂「以貨易貨」的協定，德國提供中國一億馬克貸款，中國用來購買德國軍火，中國以鎢砂、錫砂等貨物償付。先生就任初期，希特勒政府對我國尚持友好態度，一切外交和軍火的購買都進行順利。然而中日戰爭爆發後，德對我政策上有所改變，當德國和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先生一直努力說服德國保持中立，並請德國站在正義和人道立場，設法阻止日本對中國的種種暴行和侵略行爲，且抗議德國政府與偽滿州國簽署的貿易協定，但是爲了要爭取德國不改變援華政策，繼續維持軍火的供應，和保留軍事顧問，還不得不和德方敷衍周旋。

1937年八月，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引起德國強烈不滿，先生極力強調：「中國已經和日本衝突，對蘇不能不採取妥協態度，否則兩面受敵更感困難」，「這條約不是軍事同盟，只注重互不侵犯，以維持和平」，「中國不但願意與蘇聯訂約，與任何鄰國均願意訂同樣性質的條約，如果日本願意放棄侵華，中國也願意與日本簽訂條約」，「希望德國了解，這條約絲毫不影響中德友誼」。緩解了德國官員的情緒。根據德方資料，1937年德國運送中國的作戰資源比1936年增加了248%，德國軍事顧問也繼續在中國服務，因此德國遭受日本嚴重的抗議。

1938年希特勒先將政府改組，換上親日派官員，他總覽了海陸空權，並且於二月二十日在國會演講，不但公開承認了「偽滿洲國」，還將中日戰爭說成共黨與反共的戰爭，明白表示希望日本勝利，表現出對中國極端的不友善態度。次日先生與德新任外交部長面談，發生激烈爭辯，他提出強烈抗議，嚴厲地表示：「抗戰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已經下了大決心，他人支持中國固然很好，但如果袖手旁觀，我們也一樣幹到底」，「中國不願亡於日本，做日本的屬國或殖民地，所以決心抗戰」。他向政府提出召回大使，以示抗議，且表示德國遲早會停售軍火及召回軍事顧問，二十四日中國外交部雖然正式提出對德國政府承認偽滿洲國的嚴重抗議書，但是不採取其他舉動，爲了能得到德國繼續提供軍火，而委屈求全。然而德國政府三月就下令德國軍校不再招收中國學生、原定隨同德國軍艦到美實習的中國海軍人員也被禁止前往、五月下令不再售賣軍火給中國、並且召回中國



的軍事顧問。先生雖然全力以赴，一再提出抗議，也無濟於事，因此他覺得對不起國家，開始儘量謝絕德國的社交活動，他說：「我個人報國有心，但是回天無力」

在極度悲憤填膺之下，提出辭呈數次，最後終獲得批准。結束了在德2年7個月的外交生涯。

（七）從事教育工作

雖然先生是主修政治，曾出任駐德大使、江蘇省政府秘書長、監察委員、立法委員、中央宣傳部長之外，更獻身教育多年。除了擔任大學教授和安徽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外，先後任職安徽、湖北、江西和江蘇省教育廳長。1949國民政府遷台後，任政大外交研究所所長、教授、首任教育部部長和考試院副院長等。

1) 浙江大學校長（1932-1933）

1932年自從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戰爭爆發後，政府財政相當困難，浙江大學經費已經欠發數月，四月先生就任浙大校長，由於地方政府欠缺經費，浙大教授們無薪可領，他於是上京向中央政府及教育部救助，因而得到資助；蔣委員長中正也以私人名義電浙江省政府，從七月起浙大可以得到按月分發的全額經費，解決了問題，師生們都很敬佩和感激。

1933年，政府決定派先生為湖北省教育廳廳長，浙大文工兩院學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堅決挽留程校長，且決議電行政院，收回成命。他們讚揚程校長在浙大的成績，反對任何人繼任浙大校長（消息刊登於申報）。然而上電無效，先

生還是離開了浙大，擔負起中央指派的新任務。



浙江大學提供

一年來除了繁忙的校務，先生勤於寫作。浙大校刊上有他的「健行室詩存」讓人欣賞到他許多文采斐然的詩篇；或寄情山水、或憂國憂民、或送別友人等等。還有許多關於教育、政治、外交、時事、社論各方面的文章，如〈九一八事變之經過及吾人應採之方針〉等。

在1932年對浙大學生演講關於「大學教育的性質」中提出大學教育應該具備的三種性質：

- 1.人格教育：培養大學生能犧牲、奮鬥、團結、不貪污腐化、成為有遠大志向的熱血青年，去領導人民和轉移風氣。
- 2.學術教育：培養大學生為學問而學問。
- 3.技能教育：要使大學生有獨立謀生的技能。